

固执

王为松

人民社为主。”

过了一会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老总陈昕进来，在他身边坐下，他问陈昕，“王为松为什么不搬？”

这让我对他的固执有了最直接最鲜明的了解。

有一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书店和海豚出版社联合举办两海文库出版座谈会，请了他和沈昌文两位前辈，没想到那天开会前突然暴雨如注，天黑得跟晚上一样。我担心两位老人出行不便，正焦虑，两位都提前进了会场。我说，“正担心您来不了。”

他说，“说好要来的嘛。”

沈昌文在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里出了两本小册子《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我也借机提出，想把他写辞海历史和个人的编辑出版心得，编一本七八万字的小册子。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的书怎么能不放在辞书社出版呢？”

我说，“这个选题是我想出来的，正好我们有这么个丛书。”记得当时俞晓群出版人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正好刚出来。书里写了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陈翰伯陈原等一批出版前辈。

他说，“我的书都是在辞书出的。”

我说，“正因为以前都是在辞书出的，所以这本小册子放在我们这里也没关系。”

他说，“你们做得蛮好，我不在你这里出。”

干脆直接。这就没法继续聊了。他的固执，还表现为一种坚决，甚至也可以说是辞海一样的狡黠。

当年，辞海不少副主编年事已高，不能再继续审稿了，所以急需增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在学科领域有权威的副主编来加强辞海的审稿工作。他经过反复比对考虑，打算增加王元化作为辞海副主编，帮助对文学学科的条目把关审核。于是他去请示，讲述了一堆充分的理由。“嗯，好吧。”

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讲述这段故事时的神情，他说：

反正你说好的，我请示出来，马上就直去了吴兴路王元化家。元化同志看到我，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想请你当辞海副主编。元化同志也很有意思，说，巢峰同志，你搞错了吧，怎么会请我当辞海副主编。我说，我刚才请示好了才到你这里来的。等我回到办公室，电话来了：请王元化当副主编的事情，不着急，再考虑一下吧。我说，我刚才已经去他家跟他讲好了。

历史往事的纷繁难言与人事纠葛的曲折复杂，被他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这里面又何尝不是他的固执起了作用。他甚至想，做出版，尤其是做辞海这样工具书的出版，没有一点固执的精神是不行的。当然，他的固执，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脾气习性，而更多的是体现了他对出版深深地热爱的坚守，是坚持不懈的专业精神。他说过，“一个引文，每个数据，都要逐一核对，每个标点，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是我们信守的格言，而马虎草率，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行为，则是我们最为鄙视和唾弃的作风。”

写到这里，正好看到中国优秀出版编辑名单公示，“巢峰”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位当代出版文化坐标上的高峰与大海，今年刚好 90 高寿。

祝贺他，更祝福他！

2018-7-1

最近这段时间，早上醒来，闭着眼睛，有两三回，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白发，圆眼，苏北口音，声若洪钟。这形象在我记忆里是慈祥，在传说中则是严厉。不知为什么，过去的事情全清晰地想起来了，虽然我跟他交往其实非常有限。

我去医院看他，他握着我的手不放，笑眯眯地，估计是在他那辞海一般的大脑里有条不紊地搜索我的名字。好久说了一句，“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说，“怎么是老朋友呢，我们是晚辈，做学生都不够。”

他依旧说，“老朋友了。”

已经跟上次我来看他比，话少了很多。上次来，他把我们拉到护士办公室，像开会一样，瞪圆了眼睛，谈辞海的历史、个人的经历与编辑工作的原则。其实，这些话，我也已经听他讲了不少一两次。第一次听他讲，那是听故事，听往事；听多了，这些记忆也已经内化为我们自己的工作遵循。

怎么就说到出版界的一位女社长，我拨通了手机给他，没说两句，就听他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看不见电话那头说什么。

他继续问，“你今年多大了？”

应该是对方没直接回答他，他又问一遍。

我要是不赶紧接手机，怕他能一直这么问下去。我说，“女同志不能问年龄的，保密的。”

他说，“我上次见她已经好多年了，我们是老朋友了。”

他有点固执，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坚持说自己要说的话，有点像写辞海条目，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百折不回。

我跟他接触多起来应该是十年前，我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有次还有十分钟开会，一屋子人坐着闲聊。他隔着桌子问我，“你到人民社多久了？”

当时应该也就一两个月，我如实回答。他说，“你搬到人民社了吗？”

我也没多想，照实说，“还没。”

他说，“为什么？”

我一下子懵了，感觉这已经不像是闲聊了，我说，“上海书店的工作我还兼着，再说，两家社只差一个楼层，走楼梯很方便。”

他说，“你到了人民社，就应该以

六月新夏，游走中欧数国（我们传统上将捷克、匈牙利等国习称东欧，但这更多是冷战时代东西方对立而产生的政治概念，按照地理划分，是应该称为中欧的）。这趟旅程，颇多计划外的旁逸斜出——旅行的快乐，有时在于并无攻略准备和心理预备，却得不期而遇的邂逅、兴之所至的收获、无意安排的妙缘、仿如天意的巧合，随兴随意中有意外惊喜之乐（甚至一直到回来后的回味，还有这类欢欣新发现）。行程既散漫又丰富，这里只精选几个片段，与沿途购读的书和遇上的植物相关的履痕。

卡夫卡的橄榄

第一站捷克、在布拉格的第一天，晨起游览前，读一点带来的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从这本卡夫卡重要友人的权威传记中，得知当天 6 月 3 日，竟是卡夫卡的忌辰。真是注定的恰好，因为这天的安排就有卡夫卡遗迹。作为布拉格的符号之一，卡夫卡被列入旅游项目，当然是以出世天才为招牌的世俗商业化消费了，是米兰·昆德拉说的“媚雅”；但卡夫卡之于布拉格，始终是恒定的话题，何况我初抵即巧逢他逝世 94 周年，有这样一个恰当的缘由，更可作私人私意的寻访。

而且，我还先有欣然的偶遇：第一个游览点犹太区，在街头看景时，忽然发现路边一座卡夫卡铜像：他从衣服中脱身而出，“套中人”、“变形记”般的现代派风格设计，很适合这位现代文学之父。就用那本封面是卡夫卡目光炯炯黑白照片的《卡夫卡传》，与雕像合影——此后几处遗迹也作这样的留影。

随后到老城广场，看过胡斯雕像、泰恩教堂、天文钟等经典景点后，便往广场一侧寻找卡夫卡童年故居。那是他父母家的房子，正在封闭维修，只能张望一下挂有卡夫卡画像的、他出生房间的窗子。不过，隔壁有一座巍峨高耸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黄墙绿顶，古朴壮美，可以进去看看那些精美的内饰，想象卡夫卡应该与家人来过的情景。——

布拉格二题

——在中欧旁逸斜出的花枝之一

沈胜衣

饭，该店主打橄榄，墙壁、桌布、餐牌都以这种青枝小果为装饰图案，还送了我们一碗橄榄作餐前小食。边吃边翻看那本《厨房香草与调料》，里面正有此物。——说的是主产于地中海地区的木犀科油橄榄，不是我国常见的橄榄科橄榄。

前些年在希腊观赏这种著名的橄榄，兴会颇深，写过一篇《光荣属于希腊的橄榄树》。它在中欧不像在南欧那么普遍，但也是人们喜爱的植物：前一晚深夜下机后直抵酒店，门前有几棵小树，开着淡黄色的小花，我是在捷克见到的第一种花木；当时以其叶子一面青绿一面银灰，已猜是橄榄了，但因属盆栽，不像以前看过的自然树形，不敢相认；回来后请友人识别，终于确认就是橄榄，这又是一种巧缘。而且，当初在希腊见过橄榄树上的果子，现在首次认识它的花，亦很圆满。

卡夫卡也写过橄榄。网上检得他一首小诗《我触及什么，什么就破碎》，颇佳，全录如下：“我触及什么，什么就破碎//服丧之年已经过去/鸟儿翅膀垂拉下垂/月亮裸露在清冷的夜里/杏和橄榄树早已透熟//岁月的善举。”

是啊，虽然这是触及什么都会破碎的人世——此乃卡夫卡的思想 and 作品所针对、所体验的存在之本质，也是他生活的奥匈帝国风云巨变年代，包括其族群身份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本质，当然，这一直至今都是我们世界的本质——但终究，就像卡夫卡用作结尾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成熟的橄榄可以品尝，微薄却甘香，那是岁月善意的呈献。

克里玛的柳荫，昆德拉的橄榄

我们在布拉格逗留了两天，是比一般旅游团要稍为奢侈的安排，如此才对得起这座城市。其间还去了别的一些景区，包括也属无意恰好、而别有时间节点意味的圣瓦茨拉夫广场（“布拉格之春”的标志地，正对应自己整整半个世纪前的生年）。到第二日中午，在卡夫卡童年故居旁的咖啡馆吃捷克特色菜，忽然什么景点都不想去，只享受一个没有路线安排的自由午后，无目的地在老城旧街漫步，漫长的漫游，纯粹的休闲。随意乱走乱逛或喧嚣或清静的街巷，随处都可碰上风景；路过一些好看的古建筑、好玩的特产店、本地人的集市，随便看看就挺好，炎热的阳光与阴凉的风也很正好，是丰足充盈的布拉格之悠闲留白。

走着走着想伏尔塔瓦河边坐坐，于是跟着西斜阳光的方向前往。到河岸找了个咖啡馆，歇脚消磨，并读读带在囊里的一本旧书，捷克当代作家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点题一篇，真是好辰光的好文章，所谈布拉格的特质非常精彩，它的“不夸张”、“节制和忍耐”、“一种人性的尺度”，以及一种深刻的、未必全是负面意义的“悖谬”，在布拉格待着感受尤其真切。特别是，里面说布拉格“物质和精神的象征中心”是查理大桥，具体精辟所论且不管，最高兴的是我恰好就在这座连接城堡山与老城区的大桥旁读到，很喜欢这种仿如意境的机缘巧合。二十年前买的这本小书，仿佛就是为留待此时来作恰当之读了，像文中说的，因

序跋精粹

后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评论集子；我自己编选的一个个人创作诗选，已收到了清样，原计划也在稍晚一些时候出版。我在文汇报的一个朋友，还因此写了一篇题为“三位一体”的文章，介绍我几管齐下的尝试。1986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美国参加了第三次中美作家会议，与美国诗人同行作了探讨。我当时还真觉得，在怎样把写诗与译诗、中文与英文的不同感性之间转换、融合这方面，我有条件可以进一步的努力，也深信写诗、译诗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就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写的那样，在林子中选了一条路，就只能继续走下去，无法再做其他选择。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却往往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

1988年，我获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基金，可以去美国作一年学术研究。我联系了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也是艾略特的祖父所创建的一所大学，

中自然得换成了用英文写，有时候在小说中诗的感觉上不来，干脆把自己以前用中文写的诗，改译成英文，放在陈探长的名下。也算是无心插柳吧，国外有不少批评家因此说，在推理小说这一类中，写诗的陈探长可说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他在一个又一个的案子中写诗，有时还甚至在诗中获得破案的灵感；同时，他不仅仅从一个警官的视角，也从一个诗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案情背后的人性和社会因素。批评家或许能看到作者看不到的东西，至于我自己，初衷只是还想与过去一样写些诗、译些诗；在小说的创作间歇，有时也会试着把陈探长这些（原创）诗翻成中文；或更严格地说，把这些诗用中文再创作一遍。

因此这一次又得感谢漓江出版社所给予的机会，让我自己来编选一本自己的“诗与译诗”，在这过程中也能把这些年来写诗、译诗的经历作一番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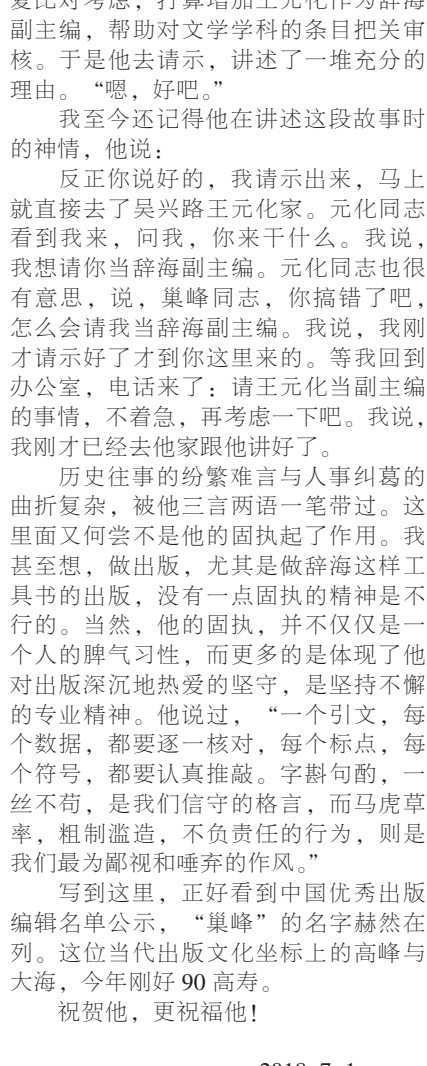
我把自己的创作诗分成三个部分：“写在中国”、“写在美国”、“中美之间”，但这里在时间和地点上的划分，其实并不是太清楚或绝对的。首先是因为时间跨度很大，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技巧、风格上的追求都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次重读，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有时甚至像是在读另一个人所写的。也有些诗最初是用一种文字写的，后来又改写或改译成另一种文字，其中的变化同样难以置信。这尤其涉及“写在美国”和“中美之间”的部分。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不仅经常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往返，更在这两种语言的创作中间不停转换穿插。参照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语言相对论”，我们或许可以发挥开去说，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对该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的过程中产生框架似的作用，导致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照世界，带来不同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语言的独特模式、形态和感性结构，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也影响和制约着思维，尤其在诗歌中凸显出来。在这些年的创作与翻译中，我确实也在有意识地做一个探索，就是努力在自己的文本中融合中文和英文两种不同的语言感性。再具体一点，也可以说是尝试着怎样把英文诗歌感受表达方式 and 句式引进中文诗歌，反之亦然。

至于译诗部分，大多数都是以前在国内学习、工作时翻译、发表过的。其中诗人与诗篇的选择更多出于个人当时的偏好，比较集中在现代主义这一段时期。这次编集子，把译文都重新修订了一下。七八十年代所作的译文，现在找出来再读，还确实找到不少错译、译得不妥的地方，借此机会改过来，多少也算是对当年的读者表示的歉意吧。

无论是写诗还是译诗，我都很幸运地得到了众多朋友与读者难以想象的鼓励和帮助。如许国良先生，他当年为我那本最终未能出版的诗集写了序，这份情至今未还；如俞光明先生，在二十多年后，居然还能在他自己一直保存的旧刊物中，找出部分我自己都忘了的译稿，拍了照再通过微信传给我；如一位我不认识的读者，在网上撰文，说他当年太认可我的诗与译诗了，因此对我写的英文小说大感失望……

雪泥鸿迹，苏东坡曾用这比喻来感慨人生的际遇飘零，转瞬即逝，但是诗与译诗，也可说成是像雪泥上留下的、或许还不那么转瞬即逝的足迹。甚至也不是我个人的足迹——那是一条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想到他至今仍对我抱有期待，希望我尽可能多地写些诗、译些诗，就觉得自己还得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尽管路途会经历曲折、变化。还是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只有尝试。其余不是我们的事。”

《舞蹈与舞者》，袁小龙著，漓江出版社即将出版。



意象成境——古刹钟声（油画）李江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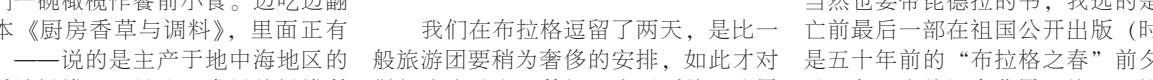
意象成境——古刹钟声（油画）李江峰

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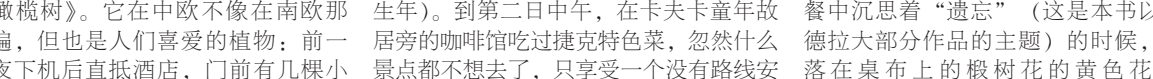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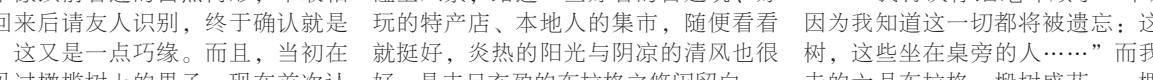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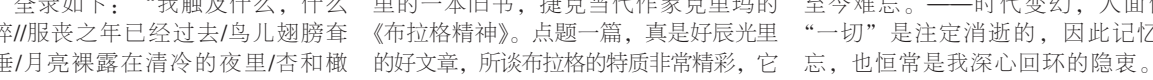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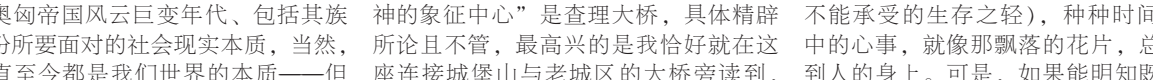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